



国家高端智库
中国(深圳)综合开发研究院 主办

快参

信息资料 欢迎交换 总第 259 期 2017.11

抓住这两个历史性大机遇，香港就能成为 内地与世界的“超级联系人”

—— 郭万达 ——

回归 20 年，香港基本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和稳定。1997 年到 2016 年，香港 GDP 年均实质增长率达 3.2%，这对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是相当高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香港失业率长期保持在低位，基本实现全民就业。香港是仅次于纽约、伦敦的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，港交所在 IPO 方面的集资额在 2015-2016 年超过纽约位居全球榜首。此外，香港还连续 23 年获得“全球最自由经济体”的桂冠。

回溯香港经济的前世今生，自 1842 年英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之后，贸易就成为这座城市最为鲜明的表征。在人们心目中，香港是一个挣“快钱”的地方，好像天生就是“短线抄手”，香港企业家热衷且擅长“短期行为”，有勤劳、冒险精神，无创新、创造基因。真的是这样吗？

实际上，香港从一个功能单一的港口城市成长为一个综合性的全球城市，从一个贸易型经济演化为今天的连接型经济，绝非“贸易”这两个字所能概括。香港经济发展模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在演进中转型，在创新中发展，在起伏中重生。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如或明或暗的礁石，大潮褪去之时，就是充分裸露之时。香港的明天与她的昨天和今天分不开，今天孕育着明天，历史昭示着未来。

“贸易 +”：最自由经济体

贸易尤其是转口贸易是香港安身立命、生存发展之根本。香港以贸易立市，贸易是香港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。香港早期贸易有两大类，一是鸦片，一是劳务。这两大贸易，在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上均有原罪性和非法性，因而被称为“黑色贸易”。在 1858 年以前，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鸦片走私中心。直到 1913 年，香港才停止向中国内地输出鸦片。而劳务贸易中充满了各种罪恶，其贸易的“黑色”程度毫不亚于鸦片贸易。

从早期鸦片和劳务贸易，到上世纪初的货物转口贸易，香港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商业网络。到“二战”结束时，香港已经是闻名世界的贸易中心。贸易带动了香港的产业和城市发展。香港的船舶修造业、金融保险业等，均以为贸易提供服务为重点。时至今日，贸易及物流仍是香港最大的产业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最大，就业规模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也最大。香港的旅馆业、餐饮业也在贸易的促进下逐步发展起来。

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是自由经济制度。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，香港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自由经济为核心的制度体系。香港对贸易基本没有管制，不提供优惠和特权，也不设置关税壁垒，私人企业开办手续简便，经营高度自由，实行低税政策，政府对市场和价格极少干预。迄今为止，香港经济的自由程度在全世界少有匹敌，“全球最自由经济体”已成为香港的招牌。

“贸易 + 制造 +”：香港奇迹

香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始于 1940 年代末。“二战”结束后，解放战争期间大批内地人赴港，香港人口和劳动力大幅增长，使香港步上从转口贸易向“贸易 + 制造业”的转型。

香港制造业大体起步于 1947 年，起飞于 1960 年代，到 1980

年代发展到顶峰，前后大约 30 年时间。1960-1979 年的大部分年份，香港制造业产值占 GDP 比例接近 30%。从现有数据看，1970 年代后期制造业从业人数大约占劳动力的 40%。制造业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，还是提供就业岗位，都具有重要地位。

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内外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因缘际会，使得香港成为劳动力、资金、设备、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之地，加上香港百年间积累的国际商业网络，以及战后欧美等西方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，香港制造业得以快速发展壮大。是制造业创造了“香港奇迹”，使香港成为与泰国、韩国、台湾齐名的“亚洲四小龙”。

工业发展乃渐进的过程，大多数国家的经验，都是先发展以劳动力密集为主的轻工业，待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之后，再发展以资本及技术密集为主的重工业，但香港的情况有所不同。香港制造业发展主要并非为了本地消费市场，而是为了出口，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，是传统制造业，从属于对外贸易。出口型轻工业的弱点是技术性竞争能力弱，对产品要求不够严格，生产技术能力幅度狭窄，对研发活动（R&D）的依赖程度比较低。

到 1970 年代末期，在人工成本提高、土地短缺以及地价高昂等内外部不利因素的挤压下，香港制造业已经难以支撑，更谈不上发展。1980 年代，适逢祖国内地改革开放，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领开放之先，香港制造业转移到深圳、东莞一带，形成“前店后厂”的合作关系。到 1997 年回归时，香港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22.5% 降到 6.0%，迅速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都市。

“贸易 + 金融 + 专业服务 +”：错失转型时机

1980 年，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接近 70%，此后逐年攀升，2015 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92.6%，其中贸易（包括进出口和批发零售业）占的比重最大，其次是金融业，第三是地

产及专业服务，后面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行政、社会及个人服务，楼宇业权，运输、仓库、邮政及速递服务，食宿及膳食服务和资讯及通讯。

目前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均为服务业。金融、旅游、贸易及物流、专业服务及其它工商业支持服务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49%，增加到 2015 年的 57%，增加了 8 个百分点。将伦敦和纽约相应年份比重最大的前四个产业与香港进行比较发现，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高于伦敦，低于纽约；金融在服务业中的地位大体相同；香港贸易及物流的服务功能是区别于伦敦和纽约的重要特征；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及通讯产业，以及知识含量较高的专业及科学技术活动，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产业，香港的表现与伦敦纽约差距较大。

总体而言，香港服务业更具传统性而非现代性，更具生活性而非生产性，更具保守性而非创新性，部分支柱产业（如旅游）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是形态还是发展水平，香港服务业都很难称之为知识经济。而服务业中金融和贸易物流的比重较大，两大产业对外部需求具有较大的依赖性，这就加剧了香港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。

以今天的视角看，香港在 1980 年代制造业北移后，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商业城市的同时，没有及时抓住发展成为知识城市和创新城市的历史机遇。一方面，香港服务业没有因应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及时创新，另一方面，香港未能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及时发展知识技术产业。最为让人叹息的是，香港未能抓住 2000 年之后全球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机会，错失了一次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创新转型的最佳时机。

“连接型经济”：虚拟化、泡沫化

当香港经济加速去制造化、去工业化的同时，香港经济已经开始从传统贸易型经济向连接型经济转变。连接型经济与贸易型经济有共同的地方，都是服务型经济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，贸易型经济注重“交易”，不排斥制造业；连接型经济注重“中介”，基本上没有制造业，做的是“流量”，靠的是“管道”。

今天的互联网“平台经济”就是典型的“连接型经济”。但香港的连接型经济还不是互联网意义上的“平台经济”，只是靠传统的服务业延伸和国际化网络而形成的“管道”。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服务做到极致，有其优势的一面，但如不加以创新，“管道”也有老化的时候，到时就可能越做越窄，直至别人用新的“管道”取而代之。

连接型经济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，即香港经济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，导致香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乃至脱节：经济增长并未转化为优质多元的就业岗位、同步的收入增长、有效控制的贫富差距、强有力的社会保障，既影响香港内生动力的形成，也影响香港社会的进步发展及和谐稳定。

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产业结构两极化。一极是“高增值低就业”产业，如金融业，一极是“低增值高就业”产业，如旅游业。

第二，产业结构两极化影响了资本、就业和收入结构。两极化导致中间产业缺乏，成为香港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，并对相关经济社会结构产生较大影响。

第三，经济增长未能惠及民生。高收入和低收入住户差距扩大，收入增长率较低。基尼系数无明显改善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，阶层流动停滞、楼价高企、创新创业艰难等问题影响到香港青年的工作和生活。

此外，这种连接型经济很容易使服务经济虚拟化，进而推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。这是全球发达经济体碰到的一个带有普通性的问题，所以近年来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展实体经济、再工业化、让制造业回归的各种政策主张。

面对全球性的转型和创新趋势，香港到了需要反思、需要转型、需要创新的时候了。

“贸易 + 金融 + 创新科技 +”：超级联系人

如今，香港经济发展到 4.0 模式，就是为“连接型经济”插上创新科技的翅膀，打造由创新科技优化连接的“管道”。一句话，就是实现“双转型”：

从传统的金融、贸易中心向“贸易 + 金融 + 创新科技”转型。香港只有向“贸易 + 金融 + 创新科技”转型，才能延伸产业链，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上升管道；

从单一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。只有向大都市群的转型，才能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，与周边城市形成基于市场的分工与功能，获得广阔发展空间和腹地。

“一带一路”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毫无疑问为香港“双转型”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。香港提出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扮演并胜任“超级联系人”角色，将使香港的连接型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。这就需要处理好“连接”香港与内地的关系，“连接”内地与国际市场的关系，“连接”好“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”，在参与国家战略同时，与内地同步发展中提升香港服务业的水平。

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从单一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提供了条件。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港澳及广州、深圳等珠三角 9 个城市，外围延伸到泛珠三角区域的 9 个省区。香港可凭借自己的优势，密切联系本

地、内地和世界，担当“超级联系人”，提升整个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和科技实力。在这种多向多维互动中，既服务国家战略，又可推动自身转型。

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祖国内地因素毫无疑问都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、最重要的影响因素，未来更将如此。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，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理由一成不变。香港经济全面融入快速崛起的国家经济，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，也是香港把握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历史机遇的关键。

（本文来源于《瞭望智库》，2017年7月5日）

郭万达 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

《快参》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。

- 读者群为各级政府决策部门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高层管理者。
- 主要内容为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分析研究，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，发表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。
- 注重思想性、启发性和政策性，努力做到思想敏锐、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，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可读。
- 稿件来源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为主，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投稿。

地址：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(518029)

网址：<http://www.cdi.org.cn> 传真：0755-82410997

电话：0755-82487878、82470960

联系人：程旭玲

电邮：chengxl@cdi.org.cn

责任编辑：廖令鹏

电邮：llp@cdi.org.cn

微信公众号：

综合开发研究院

